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军事史
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著. —2版.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ISBN 7-5065-5326-0/E·2252

I. 中... II. 田... III. 军事思想史—中国—古代
IV. E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4572 号

书 名: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作 者:《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责任编辑:陈济康

装帧设计:唐 岩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420 千字

印 张:16.12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65-5326-0/E·2252

定 价:3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再版说明

本书原名为《中国军事史·第四卷·兵法》，根据时代发展和读者需要，此次再版将书名改为《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中国军事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多卷集系统研究中国军事历史的专著，共7卷9册，约520万字，规模宏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理论研究价值，在军事学术和历史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叶剑英元帅生前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认为：“它的出版，对发掘和继承我国古代军事遗产，开创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新局面，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促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部历史专著从编写准备始到最后出齐，历时27年；从第一卷出版起算，也达10年之久。其间40余位主要编写者有近一半过世，其余现今大都病卧在床，足见其编写和出版的艰辛。对于这些为我国军事史研究和出版事业鞠躬尽瘁的功臣，祖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中国军事史》出版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电视台、广播电台及许多报刊作了广泛报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放军报全文刊登张震的序言，并加编者按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过程，我们自己的军事史终于问世了。”新华社特发通稿，给予很高评价。这部书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远销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及欧美许多国家。许多学者从各自角度引证、吸收书中的史

料和观点，促进了我国军事学研究的发展。该书曾获 1988 年度“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当代军人喜爱的军版图书奖”及“我所喜爱的解放军版图书奖”。1993 年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它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军事史》出版十几年来，经受了多方面的检验，价值日益显露，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各界人士纷纷来信来电，热切希望能修订再版。为满足读者需求，我们将陆续修订部分最受读者欢迎的卷目，单独出版。本次继推出《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历代军事家》、《中国历代军事工程》、《中国历代军事制度》、《中国历代军事装备》之后，又推出《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由田昭林、田宁先生负责修订，除修正错误外，还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充实了部分内容。期盼能继续引起读者的关注，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使之不断完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部

前 言

军事，是“一切与战争或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的统称”，军事思想则是“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①。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辉煌的战争史。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长河里，各种形态的战争连绵不断，仅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不完全统计，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就有 2000 多起。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涌现出过许许多多的卓越军事家和杰出指挥官。他们在频繁多彩的战争中，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教训。经过他们的总结和思考，逐渐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深邃的军事思想。但是，战争和军队是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等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军事思想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受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②。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③；毛泽东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④，都是完全正确的。

战争是军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第一性物质基础，要研究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首先了解战争的起源和发展。引发战争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如战国时的军事家吴起就曾提出过五种原因^⑤，前北约防务学院院长德国哲学博士 F·乌勒—韦特勒中将，也曾总结西方研究的三种起因^⑥，但从形形色色的战争起

因中抽象出的一般的战争根源，则只有一个，即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所引起的利益对抗。“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古代城邦或国家间战争，近代历史上的王朝战争、争霸战争、殖民地战争、民族解放战争，还是当代高技术战术，都没有超越恩格斯关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的，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的科学论断”。“人类社会最初的战争源于直接的经济利益对抗”^⑦这种战争起源于何时？古今中外的学者说法不同。有的认为早在原始社会前期战争就产生了，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说：原始人群的狩猎“可分为两类，一种为猎取动物，一种为猎取人（即战争）”；中国近代军事家杨杰在其《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研究》中说：“生活就是战争，人类的生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管子也有类似的认识^⑧。有的认为进至阶级社会、有了国家之后才产生战争。但是，战争起源于氏族社会的观点，基本上已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如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杜普伊在《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中说：“人类早期的战争，是由于部落之间为争夺食物、女人和土地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军事家宋时轮在《军事科学》中说：“人类的战争活动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中国古代政治家商鞅、刘安等也有相似的观点^⑨。不过说的最为科学和准确的是毛泽东。他说：“战争——从私有财产和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⑩。中国氏族社会时代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⑪。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 10000 年～前 7000 年），社会经济开始由采集渔猎向农业畜牧演变。但这时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极少，人们仍必须为果腹御寒而终日奔忙劳碌，氏族内部的劳动产品也是以平均分配为最基本的原则，人们没有私有财产。当时地广人稀，各个氏族周围有足够的生产活动空间，氏族间距离也甚远，相互很少交往，当然也就很少产生利益上的矛盾，更没有战争。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 7000 年～前 5000

年),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劳动产品除可满足氏族成员们最低生活之需外,开始有了剩余。如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石铲、石镰、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猪、狗、牛、鸡等家畜骨头;345座墓穴中,80座留有粮食腐朽后形成的绿灰,有的厚达2米。部分成员已脱离农业生产劳动,转为专门进行陶、玉等器物、工具的手工业劳动,并开始有了私有财产。按马克思的说法,最早的私有财产,就是人们随葬的工具、衣服、装饰品等^②。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35座墓,墓主们或多或少地都有随葬品。这时,以氏族为基本单位组成的部落,大多有了定居的聚落,聚落的规模和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多。并开始向部落联合体(部落联盟或酋邦)发展,由于定居位置必须选择在适于农业生产、发展和便于生活地方,受空间条件的限制,因而人们对所居土地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如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条件,所以捍卫本氏族、本部落所占有的土地,就成为全体成员的首要任务。这时期的聚落遗址,都是凝聚式的统一体,并多有环壕、栅栏或土垄或围墙等防御设施。说明这时的氏族、部落相互间已经产生了为争夺生存空间或生活资料的暴力冲突,或称之为部落战争、原始战争。这种部落战争,虽然和阶级社会的战争有很大的差别,但它是阶级社会战争的序幕,阶级社会的战争是从部落战争发展而来的。它们有着同一的战争根源——经济利益的对抗。更何况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争取经济利益(包括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有利条件)而进行的暴力冲突,已经具有政治性因素。因而,这时的部落战争,虽然在起因和目的上都远较阶级社会的战争简单,但构成战争的两个主要因素——政治性和暴力性,都已经有了。

进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年~前3500年),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剩余产品大量增加,如浙江河姆渡文化一处遗址,就发现近400平方米的

稻谷堆积层，换算为新稻，有 10 多万公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繁殖，定居氏族、部落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长。迄今已发现 1 万平方米以上至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遗址，有四五千处。不仅形成许多向心式的聚落群，而且形成金字塔式的主从式结构。以陕西仰韶文化遗址为例，全省共已发现 1918 处，面积大小悬殊，具有等级差别性质。50 万平方米以上的 41 处，皆为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其中最大的耀县石柱塬遗址，300 万平方米，富县、洛川的两处遗址，也分别为 250 万和 150 万平方米；30 万至 49 万平方米的遗址 68 处，10 万至 29 万平方米的遗址 278 处，而 9 万平方米以下的遗址却有 1531 处^③。说明聚落已经产生分化，而聚落群和中心聚落的形成，则说明以某一氏族为核心的部落联合体已相当普遍。联合体内部的社会分工和结构也越来越复杂，组织管理也越来越严密，于是出现了阶层分化，从而导致各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增大，并促使联合体的管理职能无限膨胀，发展为凌驾于联合体之上的权力机构。进而又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财产私有逐渐成为社会制度。如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地，分为若干墓区，其中只有一个墓区全是大型墓，墓主随葬的财物也都多。一般为数十件，最多的高达 180 多件。而其他各墓区，全是小墓，墓主随葬品也很少，有的只有一件石铲工具。联合体中心权力的集中，使联合体领袖可以从联合体内各部落征调人员（包括首领、勇士，各种手工业者等）至中心所在位置，以加强对内维持社会秩序、对外进行战争的能力。此外，在对外战争中俘获的外族人员，也都被留在联合体内强制劳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结构，至新石器晚期之末，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阶层分化，开始逐渐向含有地缘关系因素的阶级分化发展，最终导致阶级的出现。为争取空间而进行的部落战争，也开始向为达到扩大控制区、征伐不顺者的战争发展，神农伐斧燧之战，就是这种性质的战争^④。

进至铜石并用时代^⑤（公元前 3500 年～前 2000 年）^⑥，即原始时期（五帝时期），星罗棋布的部落联合体进一步联合，形成部族更多、落围更广、等级更高的大联合体。它的中心已成为宗教、政治、军事中心，神权、政权、军权也集中于大联合体领袖之一身，他们身边都有了由部落勇士组成的“营卫队”，如《史记·五帝本纪》就有黄帝“以师兵为营卫”的记载。营卫队的人员虽然不太多，但由于他们脱离了生产，平时担任守卫，战时成为骨干，实际上已成为专职性质的军队。更由于社会秩序的制度化（早期礼制），按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文明起源“三部曲”的理论，即“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进程，这时期正处于仍以氏族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古国时代^⑦。各联合体为保卫或扩展自己的利益，战争日渐频繁，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象征神权的玉璜，象征政权的玉琮，象征军权的玉钺和用以进行战争的兵器的大量出土，工程浩大的巨型建筑神庙、祭坛以及遍布中原江淮、山东地区的几十座城堡、城市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佐证。因为营建十万以至几十万、上百万立方米土方工程的祭坛高台和城墙，必须具备组织管理、工程技术、资源投入等方面的条件和实力，而调动巨大人力物力，通过有效的群体协作和持续劳动去完成，没有强有力的管理体系和指挥系统是难以实现的。这时期的战争，已经发展为争夺控制区或争夺领导权，由组织化的军事群体进行的有准备、有计划的战争。

据古文献记载，这时期的战争，有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伐四帝之战（《汉简《孙子兵法》佚文》），颛顼与孟翼之战（《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与共工之战（《淮南子·天文训》），帝喾与共工之战（《史记·楚世家》），尧与驩兜之战（《荀子·议兵》），尧与南蛮之战（《吕氏春秋·召类》），尧与丛、枝等部族之战（《庄子·人间世》），尧与有唐氏之战（《鶡冠子·世兵》），舜与有苗氏之战

(《荀子·议兵》),禹攻三苗之战(《尚书·大禹谟》),禹攻有扈氏之战(《庄子·人间世》),禹攻曹、魏、屈、鬻……等之战(《吕氏春秋·召类》)等。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前期的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和后期禹攻三苗之战。

有了战争活动,人们在多次重复的实践中自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思想。虽然缺乏足够的可靠史料,但从考古资料和传说中,仍可发现其军事思想的萌芽。如在部落战争时期,人们认为只要能阻止敌人不能侵入部落所在的聚落,就能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因而人们在聚落四周构筑了环壕。当进入五帝时期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弓箭性能的提高,人们认识到仅靠环壕,不仅不能确实保存自己,更不能消灭敌人,于是各联合体中心聚落,相继修建了既能遮蔽敌箭、隐蔽自己行动,又能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和机动部队,并可居高临下地发射弓箭,投掷石块以杀伤敌人的高、厚城墙。更因受天圆地方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各中心的城池,基本上都建为方形。又如舜与有苗氏之战,位于江汉和豫南地区的三苗族大联合体,向北扩展,侵入舜为领袖的中原华夏族大联合体的控制区域,舜率军将其击退后,对豫南地区的有苗氏部族,采取了政治争取手段,将他们北迁至经济繁荣的华夏族中心地区的郑州、洛阳、禹州、汝州一带,加强文化交流,变其风俗习惯,使其逐渐融于华夏族中^⑨。这种文武两手并用的思想策略和分化敌人的手段,已经带有理性认识的成分了。至于作战指导思想方面,由于作战方式尚极简单,在前期,由部落首领和军事骨干率领本部族全体或部分志愿人员,执木石工具和兵器与敌进行搏斗,战斗的胜败,完全由参战人员的多少,成员体力的强弱和战斗勇敢的程度等因素决定,没有战术可言。当然,由于先民们在长期狩猎的实践中,已经懂得了隐蔽于树上、石后或草丛中,俟猎取对象进至近旁时突然袭击,以及从四面进行向心驱赶等方法,更易于杀伤或捕获野兽,因而将这种与兽斗争的方法

运用到与人斗争中来，是非常自然的。这些方法也带有伏击、包围、追击等的战术色彩。但毕竟是自发性的，与后世的真正伏击、包围、追击等的战术不可同日而语。在后期，虽然已经有了组织化的军队，有了杀伤性能较好的专用兵器，甚至可能也有了简单的战斗队形，但由于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依然是徒步兵员的集团肉搏，所以联合体领袖和率队首领、军官的作战指挥，基本上体现在战前的组织准备和战后的处理善后工作上。战斗进程中没有什么战术指挥。当然也不可能产生作战指导的军事思想。总之，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虽然来自战争实践的总结，但由于战争方式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还只是一些本能的、自发的、零星的，总体上仍属于直观的感性认识，尚未上升到科学的、系统的理性认识高度。所以本书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夏代开始。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中国兵书的历史悠久，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蕴含着极为高深的军事思想。兵书专著之外、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的论兵篇章，也有大量宝贵的军事思想。但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研究，只能对各个历史时期中具有当代战争的主要特点而又对战争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军事思想进行扼要的论述。又由于军事思想是人们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理性思维的结晶，所以本书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争基本形态也都作了一些必要的叙述。

军事思想的分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书是依照中国军事思想本身的发展，结合历史朝代分为七个时期：萌芽发展、渐趋成熟、高度繁荣、充实提高、求实创新、系统完善到守旧衰微、新旧变革和中西融合七篇。另外增加农民战争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一篇。

注 释

①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50 页、第 22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

④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 308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吴子·图国》:“凡兵之所以起者在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⑥(美)T·N·杜普伊主编《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MILITARY AND DEFENSE ENCYCLOPEDIA)第 2885 页:“各界探讨战争起因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研究对战争起因的解释,都未能超出推行殖民主义的三个老生常谈的理由,即黄金(一切财富的简称,并指各种经济原因等)、福音(代表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宗教等)、荣誉(维护地位、保持实力或均势、民族主义等)。”美国布拉西出版公司 1993 年版。

⑦姚有志主编《战争战略论》第 20 页、第 21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版。

⑧《大戴礼记·用兵》:鲁公问“古之用兵何世起”?孔子回答“伤害之生久矣,与民皆生”;还说“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同生。”《管子·君臣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

⑨《商君书·画策》:“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已出现战争),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淮南子·兵略训》:“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小戴礼记·礼运》说孔子也认为战争起源于小康社会(即五帝时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故谋用而作兵由而起”。其实大戴(戴德)和小戴(戴圣)所记孔子之言,都是他们的认识而伪托于孔子之口而已,所以才有这种矛盾。

⑩《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 691 页。

⑪私有财产和私有制，阶级和阶级社会，是外延、内涵都不相同的两个概念。从有私有财产到私有制，从阶级分化到阶级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毛泽东说的是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战争就开始了，而不是说进入私有制社会和阶级社会后才开始有战争。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80页：“蒙昧人的财产是微不足道的，粗糙的武器、织物、家什、衣服、燧石制的、石制的和骨制的工具以及个人的装饰品，这就是他们的财产的主要项目”。

⑬见许顺湛《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载《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⑭《路史·后记三》：“神农因斧燧不悞，乃伐斧燧，而万国定”；《吕氏春秋·民用》：“夙沙氏自攻其君而归神农”。

⑮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300年～前3200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就曾出过青铜片，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因孤证学术界有争议。至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000年左右）甘肃东乡遗址出土青铜刀后，认为此时中国确已进入青铜时代已成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因为与此同时和以后，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如龙山文化（公元前3300年～前2000年）山东胶县、诸城、牟平、栖霞遗址，河北唐山遗址，河南登封、郑州遗址，山西襄汾遗址；齐家文化（公元前2100年左右）甘肃武威、永靖、广河遗址，青海贵南遗址；与齐家文化大致同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宁城遗址；北京房山、昌平遗址，天津蓟县遗址等地，均曾出土过铜刀或铜斧、铜匕、铜锥、铜镞、铜环、铜镜以及炼铜的铜渣等。《管子·地数》说蚩尤受葛卢山之金而制剑、铠、矛、戟；《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似有一定的可能性，并非完全空穴来风。由于这时期的石器仍占主导地位，所以学术界称此时期为铜石并用时代。

⑯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铜石并用时代的划分，学术界一般以前3000年为界线，此据高等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赵轶锋、赵毅主编《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的分期：公元年前5000年～3500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为铜石并用时代。并认为铜石并用时代的前500年，即仰韶文化晚期，相当于五帝时期前期，黄帝、颛顼、帝喾时期，后1000年，即龙山文化时期，相当于五帝后期，尧、舜、禹时期。

①⑦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①⑧《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吕氏春秋·召类》：“舜却苗氏，更易其俗”，《尚书·尧典》（古文尚书为《舜典》，即《尧典》后半篇）：“（舜）分北三苗”。又据田野考古：三苗族所在的屈家岭文化推进南阳盆地后，在嵩山一带禹州、汝州、郑州、洛阳等地也发现屈家岭文化因素。这些地方是华夏族的腹心地区，也是人口密集之地，不可能是三苗进攻到这里留下来的居住遗迹。加以这些屈家岭文化因素是掺杂在龙山文化之中，所以与文献对照作出北迁的解释。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萌芽发展时期的军事思想(夏、商、西周) ...	(1)
第一章 从步战到车战为主的战争形态	(1)
第一节 军政合一、步战为主的夏代	(1)
第二节 步车分编、实施阵战的商代	(4)
第三节 车步合编、车战为主的西周	(7)
第二章 军事思想的萌芽及其缓慢的发展	(10)
第一节 从卜辞、卦辞中反映出的军事思想	(10)
第二节 从两次主要战争中反映出的军事思想	(13)
第三节 从兵书佚文中反映出的军事思想	(18)
结束语	(22)
第二篇 渐趋成熟时期的军事思想(春秋)	(24)
第三章 车战极盛时期和水战出现后的战争形态	(24)
第一节 车战的战斗队形	(24)
第二节 车战时代的作战方式	(35)
第三节 水军的出现和水战	(39)
第四章 军事思想体系的建立	(45)
第一节 争霸战争中军事思想的发展	(45)
第二节 奠定中国军事思想体系的《孙子兵法》 ...	(53)

第三节 《司马法》对古老兵法的追论及对军事思想的发展	(63)
第四节 《左传》中记载的战争史	(69)
第五节 《周礼》中的军事典章制度	(70)
结束语	(73)
第三篇 高度繁荣时期的军事思想(战国)	(75)
第五章 步战为主车骑为辅的战争形态	(75)
第一节 步兵的兴起	(75)
第二节 步兵的编制与装备	(78)
第三节 骑兵、车兵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编制与装备	(81)
第四节 步、骑、车兵的战斗队形——阵	(84)
第五节 作战形式	(91)
第六节 军队的组建和训练	(100)
第七节 军队的动员、集中和开进	(103)
第八节 军事纪律	(105)
第九节 指挥通信方法	(107)
第六章 百家争鸣中的兵家及诸子的军事思想	(110)
第一节 《吴子》	(111)
第二节 《孙臆兵法》	(115)
第三节 《尉繚子》	(120)
第四节 《六韬》	(124)
第五节 先秦诸子的军事论述	(129)
结束语	(139)